

DANGDAI

WAIGUO

JIAOSHI JIAOYU

JINGPIN

YICONG

TEACHER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朱旭东 张斌贤 主编

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School 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美] 丹·克莱门特·劳蒂 著

饶从满 于兰 单联成 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TEACHER

DANGDAI
WAIGUO
JIAOSHI JIAOYU
JINGPIN
YICONG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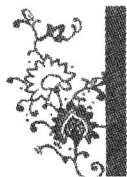
朱旭东 张斌贤 主编

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School 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美〕丹·克莱门特·劳蒂 著

饶从满 于兰 单联成 等 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 / (美) 劳蒂著; 饶从满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11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ISBN 978-7-107-24170-3

I. ①学…

II. ①劳…②饶…

III. ①教师—社会学—研究

IV. ①G4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7287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 1092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0 001~3 000册

定价: 29.4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 100081)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顾	问	魏运华	吕 达
主	编	朱旭东	张斌贤
副	主 编	刘立德	饶从满
学术秘书		赵云来	

Dan C. Lortie

School 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ISBN 0-226-49351-2

Copyright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Mainland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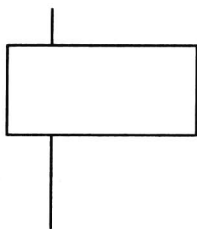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2011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d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销售。

版权©2011 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所有。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1-6770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 出版说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建立优质教师队伍，不仅需要继承我国教师教育的优良传统，也需要吸收和借鉴外国教师教育优秀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以推动人民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为己任。长期以来，我们先后策划、编译出版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比较教育译丛》等系列图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推进教师教育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我们又策划了一系列图书，《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即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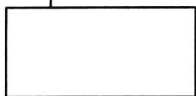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教师教育精品译丛》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发起，并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所共同组织翻译出版。

本《译丛》的具体宗旨是：第一，为高校教师教育学科建设提供文献支撑和思想借鉴。教师的素质和专业化程度直接影响教育质量，教师教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教师教育的学科建设有待进一步发展。第二，为师范生和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提供理论指导和技艺范本。新课程改革方兴未艾，一线

教师面对机遇和挑战，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他们都迫切需要指导。第三，有选择地、结合实际地介绍世界教师教育研究的最新动态，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成果，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本《译丛》从酝酿选题到翻译出版，其间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教育部有关司局、全国教师教育学会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给予了大力指导和帮助。我国教育界许多专家、学者为《译丛》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谨向关心、支持《译丛》的所有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译丛》的编辑出版或存在不足甚至错误，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师教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2009年10月



第二版前言

教育变革的速度并非突飞猛进——当今公共教育的主要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出版的1975年时大同小异。本前言主要探讨教学工作中的连续性，不过我也将提及变革和某些有前景的进展。对于那些有兴趣获取如何围绕变革与连续性开展进一步研究之建议的读者，请参照我在安迪·哈格里夫斯、安·利伯曼、迈克尔·富兰和大卫·霍普金斯主编的《教育变革国际手册》（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第1卷第145～162页中的一篇文章。

除了建议教师更多地参与关于自身工作的研究之外，本书并没有提出任何行动建议或政策启示，而是致力于描述、分析和解释。我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著述，以避免与倡导某一特定的改革计划相混淆。然而，**如果**读者认识到探寻启示（tracking implications）或提出行动建议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推测并建基于个人价值观和倾向的话，我非常乐意向大家指出教与学如何可以从本研究中受益。作为意见，这些想法并不一定拥有科学效力——然而它们的用处在于其能够激发思想，引发新的观念和产生如火如荼的辩论。我希望它们具有这样的作用。

在本前言中，我主要面向三类听众：首先是那些直接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其次是学校经营管理者；再次是那些政策制定者和型塑我们公立学校的资源的管理者。除了几处例外，本前言中呈现的观念源于《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的文本。

—

近年来有两个重要趋势在那些直接从事教学者的圈子里蔓延。首先是“专业发展”——聚焦于帮助初任教师以及经验教师提升其教学能力的活动——获得了

巨大的发展。不久以前，学区还拒绝旨在投入时间和经费用于员工发展（staff development）的计划，主张这是州政府机构的责任，并且认为在随时可能离开的教师身上投资没多大意义。而今天我们发现地方上越来越关注这样的事业。

第二个趋势是越来越重视分析教师日常的工作任务以及他们在每天工作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反思性实践”描述的是教师更长久、更用心地思考其所作所为，并努力依此指导其行动的过程。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认为这样的反思只有在其与伙伴之间的互动结合起来时才最为有效，而这些伙伴也要能够体现不同类型的教学，并可提供可替代性实践范例。正在兴起的对于分析的关注是由一些重要的教师教育中心发展起来的，并已经扩展到给教师教育者与课堂教师带来更密切、更具有成效的联系的环境。因此，本节的陈述主要是针对中小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紧密合作的大学教师以及参与员工发展的人们。

《学校教师的社会学研究》为思考和讨论实践议题提供了一些起点。当我们遇到第五章的目标讨论中发现的各种思考教学的方式时，突显（spotting）这些起点可能是最容易的。在第五章中指出了教师通常会在正规课程的目标之外“增添”一些目标，并且增添的方式各种各样——他们可能强调道德目标，关注“将学生与学校和学习联系起来”，或者谈论确保所有学生都在学习这一具体关切。阅读本书的教师可以在此问问自己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我想强调什么？做出这一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如果受到挑战，我将会如何为自己辩护？每当“重大测试”迫使教师关注测试材料时，是否还有办法塞进自己关心的附加目标？我所工作的环境是否特别重视某一具体目标？我所教的年级、科目或具体的学生是否使得某些目标比其他目标更具有相关性？

思考一下某一具体目的及其复杂性也可能很有益处。例如，拿道德教育的目标来说——帮助学生区分对与错，并学会选择前者。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大多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也有一些情形，即使是正确的选择也有难以区分的情况存在。可能必须在两个都是好的但却是冲突的选项中进行选择，或者在两个均对社会有危害的选择中决定哪个选择的实际危害较轻。这些较为复杂的决定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之间可以协同工作以帮助教师的领域。教师培养计划可以为教师提供不仅是分析一般道德问题（如教育哲学课），而且还有分析具体情境下道德问题的体验——运用基于各种实际情境和事件的教学案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专门为讨论伦理问题的案例实际上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地方的员工发展计划可以为探讨这样的问题提供机会，教师协会和工会同样也可以做到。

专注于个人反思是存在风险的——它可能被理解成改进主要依靠独自与学生

打交道的教师自身以及他们在其各自独立的课堂中的良心。但是也有一些有效教学的阻碍因素存在于课堂之外，存在于组织环境之中。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多年与运作中的学校打交道的经验，动员和维持少数成人和大量学生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到富有成效的能量，依然很难。我们的社会具有很多文化差异，这使得儿童的共同社会化总是而且尤其具有潜在的争议性。诸如此类的现实，使得很难确保组织本身不会阻碍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努力。在这里提这些就是要明确这样一点：我并不是说个体教师身上发生的变革就是解决学校中问题所需的一切，也不是说教师可以忽视他们工作于其中的组织环境。事实上，我敦促教师而那些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们尽可能全面、认真仔细地找出组织的想法阻碍其发挥功能和减少学生成功机会的点。例如，分级和分组的做法是否在“告诉”一些学生他们学不会？允许高中的学生帮派去贬低、削弱其他学生的自信心吗？学校中的成人是否向学生传达了期待于他们的混淆信息？教学所需的资源是以公平而且有效的方式分配的吗？由教师及其同伴所作的分析应该拓展到研究他们工作的学校之文化和运作，而且我认为他们应该努力使他们的观察和视野在学校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正在怎么做？”教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他们形成其回答所用的过程——在我看来，由于若干原因至关重要。教师报酬总体上是与学校目标相匹配的——他们的核心精神报酬源于他们关于其教学努力是否成功的感受。因此，对于教师自我评价问题的积极和准确回答是与高水平的学校成就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尽管也有其他关于学生学习的指标，教师拥有关于学生及其所教班级的深刻和独特的知识，这使得对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意识、一种人文的维度。尽管“督导者”在指导教师行为方面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他们的职责使得他们通常对于任何个体的教师或一群学生倾注的注意力非常有限。这样教师在每天、每周、每个月的工作过程中的决策都是在无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紧跟而来的是，有效的自我评价带来对学校教学的更好的全面监控。最后，教学工作的复杂性可能会产生对于一个人效能的怀疑，而这即使是在这样的感觉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也将会导致精神报酬的丧失。不仅随之而来的士气衰落可能不合人意，而且还有可能带来其他不受欢迎的后果。教学工作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教师通过示范在人员招募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士气的下降将会使得该职业对于那些正在考虑从事该职业的人来说显得不那么受欢迎。

第6章讨论了教师试图回答“我正在怎么做的”这个问题时遇到的脆弱性和复杂性。它揭示了大量的教师觉得连回答都很难。这些困难的程度表明，提高教

师发现学生和课堂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能力至关重要；那些培养教师的人以及与经验教师打交道的人们应该做出巨大努力以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下面有若干审慎的建议。

- 教师们反过来也是由他们自己的老师以及他们对这些老师的回应所塑造的——这样的影响会延续很多年。其结果是一些观点、情感和隐含行动（implicit actions）的一种自然积累，初任教师可能只是部分地感受到这些观点、情感和隐含行动（见第三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未来的教师把隐性的性向（implicit disposition）显性化，都将会解放他们，使其更加意识到他们在教学时的所作所为，更愿意思考之前他们未曾接触的实践做法。让学生长篇描绘他们以前的老师并与同伴分享他们的观察，就可能是这个过程的很好开端——分享此类材料以及与他人进行讨论，可以帮助个体从他们在回忆中所强调的东西以及可能赋予的意义中找到主题。回忆和回顾具体的课堂事件，可以提供机会，将从各种课程和学科中新学到的概念加以运用。聪明的教师教育者能够，而且我希望将会提出方法，可以帮助初任者增强其在促进自我评价方面的意识和在更大范围中思考选择的意愿。

- 当被要求讨论她是如何评价其业绩表现时，一位五镇的小学教师予以了热情的回答，并且长时间、非常细致地展开了她应付“那个难题”的各种方式的陈述。然而，学校中的细胞型组织设置的边界阻碍了同事之间分享由这种特别善于表达的教师所展现出的那种专业知识。尽管在有些学校存在一种专业共同体意识，但是在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隔离却是许多学校的普遍情况（对教师同事间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将会在社会学家及其他人开展的考察教师参与其中的“专业共同体”的最新研究中找到有价值的资料）。我认为，应该会找到更多方法来减少教师相互之间的隔离以及因此带来的有价值知识的损失。那些负责教师发展的人们只有将教师拢到一起时才会有用，校长也应该为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实践知识（know-how）的分享提供更多的机会。

- 我认为评价和自我评价可以从已经开发出来的技术工具中获益。我的印象是尽管录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使用，但是并不广泛。如果非常善于表达而且教学效果很好的教师将他们的课堂教学录像展示给其他教师，并提供关于什么东西影响了其教学决定的同声评论，是不是会有所帮助呢？例如，来自学生的信号，他们选择相信什么？他们又学会忽略哪些呢？市场营销专家采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来测试对商品的反应；这样的技术是否可以被用来更好地帮助教师测试和改进他们的沟通能力呢？

二

时间是学校中最稀缺资源这一根本性洞见源于我已故的朋友，经济学家查尔斯·本森。对学校经营管理者而言的最大挑战就是明智地管理时间的使用，以取得最佳的可能结果。研究教学的学者们已经确定“工作时间”（time on task）在学生学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后果是很明显的——糟糕的时间分配，由于浪费了最有价值的资源，从而削弱了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

在第七章中，教师们报告了他们认为将会使得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的那些变革，以及在另一个问题上，他们讨论了可能增加其满足感的变革。回答是惊人的相似——对两个问题的代表性回答都围绕在时间使用上。具体的细节可能会因地而异，但是我认为核心要点依然是一样的——教师们希望拥有更多“潜在的生产性时间”。这一术语承认虽然教学工作内含着不确定性，但是当时间被用于文书工作和其他与教学无直接关联的工作任务时，就不会有任何由教师引发的学习（teacher-induced learning）。

如此强调教学时间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与学习的产品有关联——将时间与学生学习结果联系起来似乎是正确的。第二个方面是象征性的。当学校日程安排和管理行动取代了教师的核心工作任务，教师可能将其解释为贬低教学的重要性，他们就会对管理部门心生不满。似乎有可能也有这样的时候，管理者无法避免打扰教师，或面临安排日程以使教学时间最大化时遇到障碍，但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尽其所能地密切关注这些考虑。例如，我曾由校长陪同在校内参观，这位校长毫不犹豫地打断课堂教学以便介绍我——这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礼节，而且由于我知道教师对此事会有什么感觉，所以也觉得不舒服。很显然，有线广播系统对于一些校长及其助手来说似乎提供了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尽管有工会协议试图阻止，教师们似乎仍然在抱怨校长召集的会议“没有必要”和“太长”。管理者应该意识到，被视为否定教学工作的核心重要性的行动阻碍了共同的目的意识的形成，而组织理论家们告诉我们，这种意识在建立对于领导的信任和实现共有目标的过程中极其重要。

为避免学监及其职员认为我是在一味地责备校长在教师中间形成浪费时间的感觉，请允许我消除他们的这种想法。一些需要花时间解决的问题均源于教育局（central office）。例如，教育局官员对校长可能增加提交报告的要求，而反过来，校长也必须要求教师提供细节报告（当校长们之前提供过这样的信息，而且知道

只要妥善保存的话就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心办公室计算机中提取这些信息时，他们会觉得尤其烦恼透顶）。迫使课程和课外活动不得不压缩的公共汽车班次安排的异常，通常也都源于教育局；当听起来与教师的情形非常相像，校长也在抱怨“不必要”或“太长”的会议使得他们远离其学校时，他们也就不太可能给教师提供什么帮助了。

当下对“领导力”（leadership）的强调可能会将学校经营管理者错误地引导到忽视有效管理的至关重要性；管理有时受到领导力理论家们的冷嘲热讽，他们使得“管理者”（manager）听起来比“官僚”（bureaucrat）这个词更糟糕。有研究，还有共同的经历，强调管理能力在指导实现目标活动中的重要性。有一个例子就是格莱恩·麦吉在芝加哥大学提交的学位论文，该论文经过相当精密的论证，提出新技术是否将被广泛采用的最佳预测因素，主要是看校长在引进和支持新技术中的管理敏锐性。当时间在学校中被糟糕地使用时，我们这些参与学校经营管理者培养的人们（正如我曾多年所做的）也应该接受部分责备。在我看来，我们对于使时间成为教与学的同盟而非敌人方面，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三

我希望以对参与学校治理或公共教育资金配置的读者说几句来结束我的前言。我将聚焦于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课题与计划，提出一种工作假设——我们需要以一种非等级化的方式来思考变革。

带有鲜明美国特色的文化通过塑造我们关于如何带来变革的观念，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我们的学校。这一文化受到两个强大力量的影响。主要影响似乎来自于美国商业的管理风格，一种多年前由雷蒙德·卡拉汉在其关于科学管理和学校经营管理的经典研究《教育与效率崇拜》中所指出的一种倾向。考察一下当地的书店，很快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有关组织、组织中的变革和领导力的著述都是写给商业企业读者的。这些著作，通常都是励志性的，建立在这样的假定基础上：公司中层级和权利的等级化分布是自然和恰当的“完成工作任务”的方式。诸如一般新闻和商业杂志之类被广泛阅读的出版物，都强调成功 CEO 的重要性，不，更准确地说是伟大。另外一个重要力量——大型政府组织，包括军队——也呈现出建基于层级差异的类似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决策权是按照由高到低渐次减弱的比例进行分配的。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政府官僚机构中，那些工作在较低层级人，在确定组织方向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或者因此他们被期待承担的

任务也都是日常琐碎的工作。

学校和学区以许多方式要求由懂行的熟练人员来实行有效管理。然而，在我们的教育规划中，我们又似乎倾向于过分依赖于这样的观念：所有的场合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有些地方教育委员会渴望参与到追求更大专业发展的运动中，立即按照等级化的方式进行思考，任命了一个教育局官员——也许是负责专业发展的助理学监——期望这个人能够按照惯常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方式实施专业发展。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很可能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要求革新计划的实施遵循通常的垂直权威路线，动员对于“绩效评定”的需求，并认为确保其实现只有唯一的道路。我认为在诸如学校这样的组织中需要有备选的领导模式，因为在学校这样一种经常性的严密督导既不可能也不受欢迎的组织情境下，需要由处于一线的个体做出明智的决定。

在《学校教师的社会与研究》中，尤其是第三章和第八章中呈现的数据，凸显了垂直权威在影响教师课堂行为中的局限性。官方课程虽然被接受为行动的蓝图，但是当教师寻求建议时，他们更有可能求助于同伴，而不是管理者；与此同时，他们告诉我们，在思考是否采纳新的教学方式时，他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考虑其与自身的人格和教学风格是否相匹配。我们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在学校已确定的目标中随便地选择个人目标添加进去。这样，由于教师倾向于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在决定如何和何时改变其教学实践方面的精神独立性，那么依靠严格的垂直控制就有可能失效。

我想再次引用一些我认为与教师告知我们的是一致的事业。这些事业表明，在培育变革方面，可以不依靠惯常的等级化权力而取得实效。

- 在我看来，专业发展学校构成近年来职前和在职教育中最有发展前景的进展之一。在我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正常的学生和杰出的教师——后者指导着新任者的努力，并为那些希望获得新的能力和洞察水平的经验教师提供机会。它们立足于我们这样的理解：教师倾向于向同伴学习，尤其是当这些同事能够展现其在教育学生方面的有效性时，更是如此。这些学校也可能包括来自大学的教师，他们不仅具备杰出教师的资格，而且也为此创新混合体（the creative mix）带来最新的研究和激发明智反思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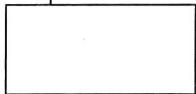
- 一个探讨入学后最初几年岁月的课题，在一组处于低收入地区的芝加哥学校静静地繁荣了若干年头。年复一年，这些学校获得了高度的评价。这一课题包含两个特色。第一个是为家长提供空间，使其可以在学校上课日期间做其希望做的事情——几乎不考虑正规课程，但是却为家长与教师提供了互动的机会。第二

个特色包括为了教学的特殊安排。每个教师都教同一组学生两到三年，每个教师都拥有自主设计教学计划的自由和购买履行教学计划所需一切的资源。在这个案例中，提供给教师的支持包括非同寻常的高度行动自由——它也表达了对于教师做出明智决定的能力的信任。与家长建立起来的密切联系，也意味着可能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

● 另外一个受到外部强力认可（受到来自于哥伦比亚大学深受尊敬的评价者的认可）的课题，看起来非常的简单。课题设立了资金以雇用人员，由这些人将教师和其他工作在这些学校的人员与外部研究和分析资源联系起来。这些人员与学校教师交谈，以明确他们在日常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当教师表示出兴趣时，那些受雇于课题的人员就会在 ERIC 和其他地方查找可能有助于解决教师个体提到的问题的资料。然后他们就把查到的资料寄给那些提到这些问题的教师，并不作任何影响其回答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提供信息。由于计划极其简单，所激发的热情几乎是令人惊异的——与“客户”的访谈给评价者留下确定无疑的印象：这些“客户”的工作受到了提供给他们的信息的积极影响。结果也对我们所听到的所谓实践者“抵制”研究和其他专业写作的说法表示怀疑。我的猜测是，这项课题之所以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其完全不存在强制。接受有用信息而又没有任何要以特定方式予以回应的压力，对于教师来说（对于其他组织的人来说或许也是如此），是很鲜见的。

举出若干例子并不足予证明一个命题。但是正如埃弗莱特·休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举证责任在于那些说曾经发生的事情不会再发生的人。在我看来，相当有必要就我们如何将绩效评定与教师开展工作和改进其工作的创造性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与实验。正如已经明确的那样，我坚信我们可以超越传统的等级和垂直控制观念丰富我们的组织策略。在这个特许学校和择校盛行于公共教育的时代，开展更多的组织革新的时机要比我们在过去所看到的更加成熟。

作为作者，我拥有首先陈述我的观点的权利。但是，现在轮到你了。作为一个读者，是接受还是拒绝我的观点，完全取决于你——你有权删减、增加，或改变这里呈现的观点。我恳请你这么做。



第一版前言

公立学校塑造着我们的年轻人并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命运。初等和中等学校每年消费数亿美元，雇用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公务员。教育在诸如种族隔离、集体谈判、政教关系以及不平等问题上动员了大量的政治能量。今天的专业教育工作者遇到了各种有关公立学校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方式，这些都迫使他们重新思考其传统，并证明其在一系列相互对立的选项中所作选择的正确性。简言之，公立学校列入我们的主要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之中。而且，它们似乎正在走向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创伤。

尽管作用重大，但是公立学校所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却相对很少。学校教育长于规定（prescription）而短于描述（description）。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工作于公立学校的 200 万教师身上。正规教育的核心业务发生在教师和学生聚集的地方，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广泛认同。几乎每一个学校实践者都是或曾经是授课的教师，教学在教育实践中处于基础地位。教师们也在竭尽全力地去增强他们对学校运营的影响。但是尽管指导教师行为举止的书籍和文章汗牛充栋，但关于教学工作——以及学校教职员的观点——的经验研究仍然凤毛麟角。虽然变革一般是在对于要改进的环境没有准确认识的情况下被提出并发起的，但如果对于学校现实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那么旨在理性化变革的努力就可能会溶解在狂热主义和包治百病的思维中。我希望这本书能增加我们对学校的了解，并激励其他人从事经验研究。

这本书涉及了教学工作组织上的诸多问题，并且探究教师对其日常工作所持的各种感情（sentiments）。统一的主题是探寻该职业精神特质（ethos）的性质和内容。我所说的精神特质指的是教师特有的、与其他职业成员相区别的取向和感情模式。当然不能断言教师在每一方面都是独特的，我们也可以发现教师的问

题和感情在很多地方与他人相似。**的确**独特的是在这一职业中所发现的特殊情意丛 (constellation) ——在教师中占主导的取向和感情的特殊组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那种模式既源于该职业的结构,也源于教师赋予其工作的意义。

本书共九章,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第一部分)是对教学若干突出的结构特征进行年代学的回顾,在此我探讨了美国三个多世纪历史中连续性与变革之间的平衡问题。第二部分由第二、三、四章组成,其中的每一章都专门探讨职业持久存续(perpetuation)的一个主要过程,分别讨论教师的招聘、社会化和生涯报酬的分配。在每一章中,我都会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问题对于教师取向的意味联系起来。由于这一职业的结构,三大取向得到不断的强化。

第五、六、七、八章构成第三部分。这一部分是按顺序排列的。不像第二部分中的每一章大部分独立成章,这一部分的论述超越四章之间的界限,重点放在教师赋予其工作的意义以及教师在履行工作任务时所产生的感情。第五章考察教师的目标;第六章考察使实现目标变得复杂化的问题;第七章讨论课堂教师的一般感情;第八章聚焦教师对其日常互动的偏好。最后一章也是独立的一部分,围绕着将来可能会显现的三种预想(scenarios),展示了本书所进行的分析与实际行动之间的某些联系,也提出了几点值得进行额外研究的地方。

公立学校和任课教师多少代以来一直构成美国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虽然研究太少,但依然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我们所熟知的社会部门为社会学家提出了特别的问题。为了获得新的理解,他必须透视使其研究对象深陷其中的传统定义,需要某种方式来穿透弥漫于文化中的“现有”(hand-me-down)描述和解释。尽管成功地获得这样的视角总是相对的,但的确存在一些有益的研究策略。在我使用的策略中,有一种将天真与怀疑主义结合起来的立场——一种对人们关于教学工作和教师的常言常识进行质疑的方式。限制一个人对回答的控制也是有用的。因此,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种开放式探究,允许教师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世界。时而我也发现,设计独创的分析图式来解释资料是有帮助的。然而,我相信在研究像教学工作这样一个为人们所熟悉、高度认同的部分时,最有用的策略就是比较法。反复提醒教学只是人们用以谋生的众多方式之一总是有益的,分析也一再通过将教学工作与其他职业进行对比来展开。

本书使用了若干种方式和方法,包括历史回顾、全国性和地域性的调查、在其他研究人员的观察研究中寻求发现,以及对深度访谈的内容分析。我已试图使方法与要考察的问题类型相匹配。其中一些资料允许进行量的分析,但也有一些由于样本规模和代表性的局限限制了对亚群体的分析和概括。了解特定工作领域